

都体现了中国在世界学术领域中的影响,都是中国的知识与文化从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向世界性的知识和文化演进的成果。以学术形态呈现出来的中国学著作,应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加以对待。

海外中国学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发挥着重要作用。绝大多数中国学专家是中国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的学术著作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翼,在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展开的今天,无视中国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拒之门外,既是狭隘的,也是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历史的无知。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代中国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中国学专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各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中国学专家与中国学人交往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就中国来说,中国学术在这过程中逐步向现代化形态发展。因此,加大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中国学专家的互动,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在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跨国别条件下的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这个特点决定了从事这一研究与仅仅立足于国内学术所展开的学术对话有着重要区别。因而,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立场不可或缺。要做到这点,我们应认识到: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展开批评的中国学的基本出发点,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审视海外中国学的基本学术立场,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辩证把握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的关键。唯有如此,中国学术在全球才能展示自己的学术立场,彰显中国学术博大的胸怀和无穷的魅力。

## 美国中国学研究取向转变过程的反思\*

侯且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从传统汉学(Sinology)向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学术史过程,社会科学在其中发生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通过深入思考,进一步转向跨学科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他们开始逐步挣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摒弃“冷战”思维,真正走进中国,尝试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与人文历史研究相结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实践。本文试图以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为指导,对这一历史过程作出学术史的反思,以期丰富对美国中国学的认知。

### 一、从“共产主义问题”研究转向“地区研究”

20世纪60年代始,随着中国学经历麦卡锡主义肆虐后的复苏,以及社会科学的介入,美国的“共产主义问题”研究开始转向“地区研究”,中国研究的多元化取向开始形成,打破受“冷战”支配的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中国学百年流变及其影响研究(1900—2000)”(项目编号:18BGJ084)的阶段性成果。

1959年6月19日至21日,在纽约大学举行的著名的“古尔德会议”(The Gould House Conference)研讨重建中国研究,并且试图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研究。会议决定,成立“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由约翰·林德贝克(John Lindbeck)担任主席。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学的复苏也有赖于俄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推动。在美国,从事俄国研究的人比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对政府和基金会的影响力更大。中国学同俄国学、苏联学(kremlinology)有着很大的区别。从历史上看,苏联学是专门为“冷战”服务的,它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冷战”的产物;而中国学有汉学传统,它的历史要比苏联学长,只是它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脱离汉学传统,向着地区研究的方向发展。从研究内容上看,苏联学的中心是政治(确切地说是政策),它侧重于研究苏共政权及其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学的中心是史学。对中国学研究来说,苏联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冲击性影响。

1962年初,乔治·戴德华(George E. Taylor)<sup>①</sup>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中国是我们当前的问题》的文章,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震动。<sup>②</sup>他认为,“同苏联相比,共产主义中国几乎对美国学术界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其缘由是“1949年以前中国问题研究的条件发展缓慢,以及美国国内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但是,不管原因如何,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加强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目前,由于“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很多私人基金会似乎也愿意资助中国研究。应该说发展中国研究的时机已到”。<sup>③</sup>

戴德华进一步分析了深化中国研究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他指出,“目前最为主要的问题是概念问题。我们有自己理解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与我们的主要历史是一致的,我们的很多著作是肤浅的,纯粹是在堆积事实,它们不能给人重要的启迪。我们也还没有能够发人深思的传世之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修正旧的国家观、民族观、国际关系和同盟观”,进一步“加强对共产主义的基础研究,同时也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研究”,促进“各种学科的相互配合与运用”。这是“对我们整个学术知识的挑战,涉及到我们所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学术传统”。<sup>④</sup>无论戴德华的思想倾向如何保守,也不管他的中国研究动机是否带有更多的功利色彩,就他提出的问题来看,确实抓住了有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还有弗雷德里克·弗莱罗恩(Frederic J. Flernon)编辑的题为《共产主义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论文集。这本书收录了关于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代表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罗伯特·塔克(Robert C. Tucker)的《论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该文论述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和地区研究的关系,指出:“如果说共产主义多样化的发展时代是扩大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地区研究的发展、积累就是另外一个条件。没有建立在国家研究之上的坚实基础,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分析就可能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说教。但是,我们今天

① 美国的俄国问题研究专家,时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② 麦卡锡主义横行以来,似乎没有人敢这样提出问题。据费正清回忆,尽管戴德华的活动和思想都是“亲”国民党的,但他的同事担心他在思想上出现“亲”共产主义的“偏差”。

③ George E. Taylor, “Communist China—The Problem Before US”, *Asian Survey*, Vol. 1, No. 2, 1961, p. 32.

④ George E. Taylor, “Communist China—The Problem Before US”, *Asian Survey*, Vol. 1, No. 2, 1961, p. 33.

有这样的基础,或者说接近这样的基础。特别是关于苏联的地区研究中,对制度、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考察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有了长足的进展。对于东欧、中国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的研究还是年轻的,不够深入。在这方面的地区研究专家无疑将把扩大研究作为首要任务。不管我们现在的地区研究能否为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起点,但是乐观地说,充分的地区研究无疑有助于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进步。”该文特别强调,地区研究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两者相互促进。“尽管看起来其利害关系的趋向有所不同。地区研究实际上先于比较分析,但后者包含有前者,两者相互作用。而且,地区研究并没有被削弱,比较研究的发展可以为地区研究开辟新路,丰富地区研究的分析内容,很好地促进地区研究”。基于这种认识,该文提出要努力寻找这两种研究的汇合点,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要坚实地以地区研究为依靠。<sup>①</sup>

通过塔克的分析,多少可以窥见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基本内容。透过这些还不够全面的分析和有待研究实践检验的研究模式,还可以对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性质、对象及其试图解决的问题有一个概况式的了解。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出现,一方面说明 20 世纪 50 年代盛行一时的“共产主义阴谋论”“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观念”已经动摇;另一方面说明美国学者已经承认共产主义不仅在发展,而且共产主义的发展存在着多样性。这是十分重要的观念上的变化,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 二、“中国中心观”与“现代化”取向之关联

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讨论以后,在美国中国学界,跨学科的地区研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一直是学者们探索的重要课题。当时有学者,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家既要走进中国学领域,了解中国学的经验,又要走出西方科学传统,把中国研究建立在非西方科学传统之上,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伟大的中国文明。社会科学家要和历史学家相互配合,因为“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兴趣仅仅在当代,而把过去留给了历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sup>②</sup>

但是,在中国研究中成功地运用社会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社会的范例并不多。<sup>③</sup>分析个中原因,<sup>④</sup>我们必须认识到,麦卡锡主义对中国研究造成的影响难以完全根除。“由于麦卡锡时代的伤害,学者们一直对卷入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心有余悸。”这种在“麦卡锡时代产生的恐惧几

① Robert C. Tucker,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sm”, in Frederic J. Flor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9, pp. 49 - 62.

② G. William Skinner, “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 *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Vol. 23, No. 4, 1964, pp. 518 - 521.

③ 傅高义(Ezra F. Vogel, 1930—2020 年)的研究是一个特殊的范例。他早期从事日本研究,后转入中国研究,比他的前辈更加社会科学化,因为他的基础专业是社会学。他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注重个案研究,长于实证分析,在研究实践中更讲求与异国(研究对象国)学者相互合作。他敢于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深入时代关注的主题,同时亦将历史研究的时限切近于现实,探究 1949 年以后的中国社会。

④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自身变化的原因。这里,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另文讨论。

乎使美国失去了整整一代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除了极少数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越战’初期几乎都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缄默。”<sup>①</sup>在新一代青年学者看来,中国研究应尽快走出这种沦为政府情报工具的怪圈。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走出这种怪圈?这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思指导中国研究的理论及其取向。于是,时代呼唤理论,理论应运而生。新一代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典型的代表是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柯文(Paul A. Cohen)。他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过程以及指导研究的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理论框架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性的估量,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研究的指导性思想——“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sup>②</sup>一书中全面地回顾了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过程,批判了这一过程中占有统治地位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与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sup>③</sup>

柯文认为,这三种模式给历史学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三个模式都受同一弱点的制约: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正如一切带有明显的目的论倾向的取向那样,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循环推理,因为它们最后在庞大复杂的历史现实中所发现的现象恰恰就是它们一开始就要寻找的现象”。<sup>④</sup>

柯文对指导中国研究的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模式批判,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左翼批判思潮已经接触但又未完全澄清的“争论的中心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要“把这种歪曲减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脱出来,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sup>⑤</sup>这种新角度就是“中国中心观”。它具有四个典型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sup>⑥</sup>

① Judith Coburn, “Asian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the Chrysanthemum on the Sword”, in Edward Friedman and Mark Selden, eds., *America's Asia: Dissenting Essays on Asian-American Relations*, Random House, 1971, p. 77.

② 该书的英文版于1984年在美国出版,中文版于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里我们看一下该书书名的翻译,中译本译者将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直接译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而英文题目实际的意思应该是“兼评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作”,“中国中心取向”只是其中的一种观点,并非全部。译者这样处理,确实容易导致一般的读者对全书产生误读。

③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序言”,第1页。

④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第5页。

⑤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第1页。

⑥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65页。

显然,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特别强调“内部取向”,并且赋予“内部取向”实际而充实的内容;它主张加强微观的社会历史研究,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它试图同社会科学结盟,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很多学者从社会科学和跨学科研究出发,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现代化既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又被作为指导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他们认为,“使用现代化这把钥匙来研究中国,是一个手段而并非目标,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sup>①</sup>现代化“并非等同于‘工业化’或‘西方化’”,对它的研究目的在于“对中国最近的社会变革有更多的了解,并希望在研究中国的基础上改进对其他社会变革的一般认识”。<sup>②</sup>通过分析现代化论者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化研究的特色,其中加强“内部取向”研究是现代化学者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sup>③</sup>

从现代化取向研究中国与从社会历史取向研究中国、地区研究取向研究中国具有根本性的区别。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的两份重要报告(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和西里尔·E. 布莱克等人撰写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sup>④</sup>我们分析一下其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种研究是以中国为中心,而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现代化研究者认为,“早期现代化国家和后来者的现代化过程主要都是内部的转变”。中国学研究“很少把中国作为中心,倘若对全世界的综述中,以其他地区为基础而忽视了中国,又不去检查一下其适用范围多么狭窄,那么人们都不会从这种极端的地区观念中获得多少慰藉”。<sup>⑤</sup>他们相信,对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剖析,“能够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科学的重要问题上来,能够把许多学科的资料汇集起来,从而使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都充分地显示出来,而对中国的研究很少这样做过”。<sup>⑥</sup>

第二,这种研究具有动态性,并不把中国社会看作是“超稳定的”“长期停滞不前”的社会,与亚细亚社会论者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前几个世纪被中国所夸耀的社会形式稳定和社会体制明显延续的记录,正表明了该社会的停滞不前、或者说没有取得持续的社会发展。”<sup>⑦</sup>现代化研究者认为,“如果用城市化、市场扩大、管理官僚化和教育水平等社会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属于一批具有实质性发展的前现代化国家。中国的早期成就曾经创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录,但是到了帝国时代后期——尤其是在清代——它不属于拥有一定推动力的社会,而这种推动力则意味着前现代社会内部加速度的变革。”<sup>⑧</sup>

第三,这种研究在考察中国的变化时,注重考察教育制度的变革,将“现代知识的空前增长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陶骅、杨砾等译,白自然、罗荣渠等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②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6、7页。

③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④ 两者如同姐妹篇。作者指出,“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对此从事研究10年了。这个研究过程是连续的,而这两本书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补充的,为所提及的各个题目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比较。”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前言”,第3页。

⑤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17页。

⑥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序论”,第3页。

⑦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279页。

⑧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281页。

看作是历史的动力”。<sup>①</sup>这与西方传统的“冲击—回应”模式有别,可谓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

第四,这种研究明确使用新的研究手段,现代化研究者主张采用多学科的研究。“通过采用多学科、多方面的手段并以综合的方法去检验通常被孤立对待的历史时期”,用以“探求建立对中国研究的新开端并开辟新的前景”。他们还特别指出,“社会发展的水平应当用最有效的指标——政治、经济、人口统计和其他(没有一个是完全满意的)来衡量,而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或其他制度上的标准来衡量。”<sup>②</sup>可见,现代化研究者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认识和评价标准,力图走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标准的认识误区。

第五,这种研究把现代化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和有碍于现代化的因素,从而为现实的现代化服务。现代化研究者从否认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基本观念出发,将中国社会看作是一个动态社会。他们指出,为了探讨现代化的“长过程”,必须“对现代化之前的稳定局面和与现代化国家接触之前模式的变化取得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同时,“有必要考虑从历史记录里看到中国早已具有的现代特征的影响”。<sup>③</sup>

第六,这种研究力图摆脱地区研究的影响,“探求建立对中国研究的新开端,开辟新的前景”。<sup>④</sup>同一般地区研究相比较,现代化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框架不同、研究概念不同、分期标准不同,因而结论也不同。他们主张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增长、社会一体化、知识和教育五个方面构成一个现代化研究结构。他们注重考察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注意那些影响中国反应的历史因素”;他们“探索着去解答国家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够加速现代化进程”,“政治领导是否是现代化主要格局的决定因素”;他们考察经济结构和发展,“探求确定哪些历史条件有利于经济增长,增长的速度有多快,以及指导经济增长的政策有多大效果”;他们把社会一体化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因素视为“现代化的可能指标”,作为“促进经济发展过程的潜在动力”;他们高度重视知识和教育,对现代化的重要性,充分肯定它们“对形成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起了决定性作用”。<sup>⑤</sup>现代化研究者极力避免使用西方学者惯用的概念,如“传统社会”“西方化”“欧洲化”“帝国主义”等。在他们看来,用“传统社会”概念无助于说明“非现代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传统社会”并不是与“现代化对应的没有区别的清一色的社会”;“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有些老传统仍然是重要的”,“传统的形式对现代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sup>⑥</sup>“当旧与新并存的时候,这种旧同原来的旧已经根本不同了。实际上,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所受到的限制只能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即现代化以前的形式和现代化形式本身的生命力。”他们不愿使用“西方化”和“欧洲化”的概念是因为“人们常常运用这个词来指这样一个事实:对所有跻身现代化行列的后来者来说,挑战都是来自外部的”。<sup>⑦</sup>这两个概念会带来很多无法解释的矛盾。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16页。

②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14页。

③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8页。

④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7页。

⑤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10、11、12、13、14页。

⑥ 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第23页。

⑦ 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第24页。

### 三、“亚洲农业社会范式”与中国的社会科学实验

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中国中心观”,这是时代给美国中国研究者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在中国学领域,有学者试图从理论上对中国研究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为“中国中心观”作出理论上的延长。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提出的“亚洲农业社会范式”(The model of Asian peasant societies)理论就是典型的一例。<sup>①</sup>

利特尔对柯文的主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的很多中国学专家研究中国的历史起点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这是美国中国研究存在的主要弊端。柯文指出了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有些美国学者那里,“西方的经济革命的起点在英国,因而往往是把英国与中国相对应,用以研究传统中国的农业经济。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那将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果。”<sup>②</sup>这也就是说,会呈现一个英国式的中国。因此,利特尔并没有完全满足于效法柯文的论证,仅仅停留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之上。他指出,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也必须引起注意,这种作法并不是说在对亚洲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建立一种与亚洲历史经历相吻合的新观念或新模式,而应该是要求研究者自我意识到欧洲历史的特殊性,根据亚洲范式的特点选择和修正理论。<sup>③</sup>

利特尔在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一个“非中心问题”。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把问题全部解决了。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这样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分析当代史学发展趋势时曾经告诫各国史家: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要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而且“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无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sup>④</sup>因为无论以谁为中心,都“只会更加片面,更加陈旧,它们全都不能充分取代全球的普遍观点”。<sup>⑤</sup>

关于“非中心问题”,确实是“中国中心观”应当加以补充说明的问题。这种补充最主要的是关于理论的说明。利特尔的“亚洲农业社会范式”理论产生于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他试图在对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作出反思、检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亚洲农业社会的变化作出科学的解释;通过具体的历史内容和社会科学实践,说明什么样的理论才是对社会现象最好的解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究竟应该如何运用理论模型。

为此,利特尔做了具体的实验。实验对象就是亚洲农业社会所依据的理论,既包括分析现代工

① 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系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他以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与方法论见长,他的研究视角不是纯哲学,而是通过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发现其内在的方法论特征。在中国研究方面,他尤其重视中国的乡村变迁研究。

②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5.

③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p. 212-216.

④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⑤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62页。

业社会的理性选择理论,又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利特尔的这种作法,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的新动向,即“调和倾向”。一些学者试图通过“调和两种相互对立的研究理论和学术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学说”。<sup>①</sup>他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主要是用来详细解释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它“很少用来解释农业社会”;“然而,农业社会似乎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检验范例”;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就应该用它来分析农业社会;强调“分配和唯物的生产制度”的理论与“技术创新”的理论都应得到重视。<sup>②</sup>

显然,利特尔反对在学术研究中排斥马克思主义的作法,当然他也不主张过分夸大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因为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东方问题时毕竟遇到了新的挑战。例如,在农业社会的变化中,有一系列的变量在发生作用,这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所没有预见到的。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因素是第二位的,而宗族血缘关系则是第一位的。变化中的农业社会的实际远比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复杂、多样。因此,在中国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应作为社会发展形式的最终结论。<sup>③</sup>

利特尔详细地解释了他提出“亚洲农业社会范式”理论的初衷。他指出,他的学术兴趣在于探讨“文化相对论和社会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历史、社会现象是普遍的,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寻求规律。要科学地解释社会现象,不能仅仅停留于描述事件。对地区研究来说,理论无疑非常必要。形成有关历史过程的假说,是社会科学理论的首要任务。<sup>④</sup>

利特尔将其范式理论的分析重点放在中国,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解释社会变化所习惯使用的中心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以欧洲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亚洲社会和非欧洲社会的变化过程,这对跨文化的规律性研究多少是一个推动”。<sup>⑤</sup>在他看来,处于亚洲文化中枢的中国“是一个使罗马帝国相形见绌的帝国,它的经济远胜于欧洲中世纪的经济系统,它的科学文化的发达在时间上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而它的内部叛乱带来的损失则大大超过了北美当代的叛乱和可怕的独立战争。而且中国革命是由一个代表着武装农民的党所完成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就完全类似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实验室。通过集中研究中国,完全可能提出并且有效地讨论任何社会调查方面的问题,发现以分析假说为基础的大量的经验性数据”。<sup>⑥</sup>

利特尔还专门研究了中国农民起义的特点。他认为,在中国农业经济史中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一般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由宗教和秘密组织发动和领导;大多数的起义发生在经济危机时期,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很少是经济性的,起义最后大多以失败告终。中国19世纪的农民起义与20世纪的农民起义有三个明显的区别,即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政治的结合,政治组织

①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 106.

②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 106.

③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p. 141 - 142.

④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 3.

⑤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 3.

⑥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p. 218, 168.



的现代化,阶级斗争的参加者的队伍需要领导。<sup>①</sup>

利特尔的这些见解和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中国学者的观点很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中国中心观”的内部取向,也应该包括接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内容。虽然利特尔的理论不像柯文的批判理论那样紧密结合中国史研究实际,但是我们从他的理论中仍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动向:他们在摸索中国研究的新途径,逐渐转向重视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宽容、客观的态度,主张逐步调和和对立的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促进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 四、费正清的“疑惑”与傅高义的实践

从中国研究的发展着眼,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真正的结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既是一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过程;又是一个理论的综合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在综合的过程中,两者都必须考虑自身的特点,最终实现互补。

柯文认为,在中国研究中,“从直接应用社会科学理论而取得真知灼见方面说,则一直进展缓慢。在这方面的新近探索被认为是牵强附会,受到多方批评。有人感到在不少情况下理论不是和史料真正结合而像是‘贴在’史料上的标签,有如两人虽已结成夫妻,但始终未能臻于良缘,给读者留下格格不入之感”。<sup>②</sup> 最令人却步的难题,是“要求史家的大脑能掌握全然不同的许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论与策略(这些学科往往超出社会科学范围,涉及数学,乃至应用自然科学)——而这副大脑,如果恰恰装在一位研究中国的美国史家的脑袋里,则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一两种语言苦战多年了”。<sup>③</sup> 上述“难题”确实道出了中国学专家的苦衷和局限,说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研究中,笔者注意到,对于中国研究中运用“现代化”研究取向可能发生的问题,美国中国学的奠基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表示了某种担心。

到了晚年,费正清对自己所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反省。他认识到,要分析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要把外部影响同内部作用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指出,“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是经过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sup>④</sup> 笔者认为,费正清的反省尚留有余地,没有达到他的学生们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认识境界,也没有完全否

<sup>①</sup> 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p. 218, 168.

<sup>②</sup>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62页。

<sup>③</sup>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63页。

<sup>④</sup>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定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sup>①</sup>但就他个人的认识而言还是迈出了新的一步。毕竟他能公开承认要考察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注意到内部与外部两者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sup>②</sup>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心理影响要比经济影响大得多,它“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它直接“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sup>③</sup>因此,在评价费正清的历史认识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他的思想变化。

与对自己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省相联系,费正清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却缺乏理解和信任,这种态度与美国学术界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学术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费正清最担心的是: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中国可能会使研究简单化、范式化,而且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假设,尚未见到具体的研究范例。他指出,“现代化”概念“属于超历史的范围”,“历史学家真要使用它,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一般地说,帝国主义指外国的主动行动,现代化则是国内的进程。”<sup>④</sup>即使如此,也还有很多问题,“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近代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不一定适合中国。“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入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指用于中国——引者注)却可能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sup>⑤</sup>“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它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sup>⑥</sup>费正清甚至怀疑,“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他进而担心:现代化“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的篮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sup>⑦</sup>

从费正清对现代化模式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研究模式愈加谨慎,担忧模式的干扰会限制自己的视野。他对研究模式抱有的警惕反映了老一辈中国学专家对待史学与社会科学相互结合的基本认识。在美国学术界,尽管这种结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由于成功的研究范例尚不多,所以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确实不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与发展,美国中国学专家更为关注中国的现实,深入中国的社会实际,用研究实践回应了费正清等人的疑惑,才算解开了费氏的心结。最典型的范例就是哈佛大学傅高义的第

① 费正清认为,帝国主义的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它被中国学者扩大了,几乎扩大到19世纪以来的一切对外接触。在中国的旧秩序下,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8页。

②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8页。

③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卷前言”,第5页。

④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下卷前言”,第4、5页。

⑤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下卷前言”,第5页。

⑥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下卷前言”,第5—6页。

⑦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下卷前言”,第6页。

代中国研究。傅高义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发生巨变,能够从革命走向现代化。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中国社会竟能产生了内生动力。旧有的“帝国主义”取向、“革命”取向、“民族主义”取向都失去了认知中国的效力。认识这样的巨变,只能进一步从社会科学中汲取养分,“现代化”取向自然成为首选。

全面评价傅高义的中国研究显然不是本文的任务。<sup>①</sup> 这里,仅就其研究取向的变化作一分析。

在哈佛大学,傅高义接受了系统的地区研究训练,任教后从事日本研究和中国研究。他的中国研究从“广东研究”起步,先后有两部专著问世,可视之为姐妹篇。一部是196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1949-1968*)。另一部是198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是地区研究与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相融合的结晶。它证明,“共产主义不仅在发展,而且共产主义的发展存在着多样性”,这“对中国的中国研究将产生积极的作用”。<sup>②</sup> 在“冷战”中,傅高义能勇敢地挣脱意识形态藩篱,深入当代中国社会内部做具体的个案研究,冷静地对这个复杂的社会作出客观的观察与分析。凭借他对广东研究的经验,他的社会调查的对象仍然是放在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1987年,应广东省政府邀请,傅高义历时八个月,走访七十多个县,深入考察广东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不仅写出了考察报告,还撰写了专著《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从表面上看,我们了解的傅高义的研究集中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sup>③</sup>但从学术史和研究取向着眼,他的研究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独有的特点——所展现的是社会科学对共产主义问题研究的深入,以个案研究取代一般的叙事,更注重动态研究,进行“中国中心观”的实践。

傅高义在2007年为《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说道:“我的导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教授就曾告诉我要经常尝试着系统地思考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思考不同的社会是如何与之相适应的,同时还要明白致使社会变革的源流在哪里。”<sup>④</sup>此外,“深入了解日本的经验也让我看到了不同社会间如何处理问题的联系。我从中知道,不能把官方说法当作事情的全部解释,而应该常常探究更内在的关系以及更深层次的态度。”<sup>⑤</sup>因此,我的访谈“集中于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得以“勾画出一幅广东实况图”。<sup>⑥</sup>

关于共产主义研究与社会科学之结合的目的,傅高义阐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因此,“我们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sup>⑦</sup>

① 关于该问题的详细情况,参见侯且岸:《从学术史角度认知傅高义》,《国际汉学》2021年第1期。

②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③ 傅高义在荣休后还写了《邓小平与中国的巨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2011年该书由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出版,2012年该书的中译本《邓小平时代》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自此以后,傅氏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④ 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高申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序二”,第3—4页。

⑤ 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序二”,第4页。

⑥ 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序二”,第2页。

⑦ 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序二”,第4页。

## 结 语

基于以上分析,读者不难发现:在美国,由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科学和跨学科研究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和延伸、“现代化”研究取向的确立,都大大拓宽了中外研究者的视野,产生了文本以外的深远影响。同时,这种转变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研究的未来方向,使之摆脱规范认识的束缚,也使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学科的学术史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借助于哲学,中国学研究(包括地区研究)的深化同样需要理论。

本文通过反思,从动态过程考察了严肃的美国中国研究学者的研究取向所发生的变化。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没有完全固守“西方中心主义”和“冷战”思维,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看待中国,当然他们也没有能迅速地转向“中国中心观”,而是有一个理性的思辨过程。最终通过自我调整,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内部取向”,探究中国社会内生动力的学术实践,佐证“现代化”研究取向的有效性和内在价值。这是一个认知中国的学术史、理论史的典型范例,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

## “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中国研究的三种叙事

周 武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中,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深度地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使“世界知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大举进入中国,并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扎根;这种交织,也使“中国知识”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世界。笔者把这个过程称作“中国知识”的世界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研究日益显示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盛况。<sup>①</sup>在这个过程中,本土的中国叙事与海外的中国叙事的交流互鉴日益频繁,并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流互鉴中逐渐形成中国研究的第三种叙事,即以中外交流互鉴为主要形态的世界中国叙事。这种叙事的出现不仅给本土的中国叙事与海外的中国叙事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将赋予中国研究更恢弘的立意、格局与气象。

### 一、中国研究的世界化

世界中国叙事以中国研究的世界化为前提,没有中国研究的世界化,自然也谈不上世界中国叙

<sup>①</sup> 早在20世纪末,哲学家冯契就已敏锐地觉察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这一问题,他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为此,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也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东方文化,并深入地作比较研究。这就需要有許多人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做工作,于是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意见,形成不同学派。所以,应该说,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参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7页)这是从未出现过的历史现象。